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台湾当代散文 空间诗学研究

——以台北为中心

林 强◎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台湾当代散文 空间诗学研究

——以台北为中心

林 强◎著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当代散文空间诗学研究:以台北为中心/林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 - 7 - 01 - 017469 - 3

I . ①台… II . ①林… III . ①散文—文学研究—台湾—当代 IV . ①I207.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2572 号

台湾当代散文空间诗学研究

TAIWAN DANGDAI SANWEN KONGJIAN SHIXUE YANJIU
——以台北为中心

林 强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469 - 3 定价:6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学术评价体制研究”（批准号 16CZW049）资助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979—2010）”（批准号 2012C089）资助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散文与诗的关系及其文体理论研究”创新团队资助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本与批评”创新团队资助

总序

2004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批建设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人文福建发展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评为省高校优秀社科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学校于2014年4月成立了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聘任郑家建教授为研究中心主任,以更好地发挥文学院在中华文学传承发展方面的科研优势,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闽台文化合作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该研究中心于2014年6月经过专家评审,成功晋升为福建省首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层次学术平台,担负着组织科研创新团队、产出重大研究成果、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社会咨询服务、培养优秀科研骨干、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重任。省社科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经过几年的建设,力争成为国家或省级高层次智库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福建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3个福建省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以学科发展与

2 台湾当代散文空间诗学研究

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结合文学院的既有学术传统,确定中心的重大学术课题,围绕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与福建省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

中国语言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成了联结全球华人共同家园的精神血脉,而且对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流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学在传承中华文明及促进闽台文化的合作交流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点,对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闽台语言、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渊源流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为当前建设繁荣和谐的社会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加深两岸人民共同构建精神家园的情感联络,为促进闽台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作贡献。

研究中心聘任国内著名专家担任顾问和学术指导,对中心工作提供了强有力地指导。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担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副校长郑家建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研究中心的日常事务工作由常务副主任葛桂录教授负责。本中心的特色研究方向有四个:闽台语言文献与文学交流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林志强教授、郑家建教授;文体学研究方向,负责人为李小荣教授;中华文学域外传播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葛桂录教授;当代文学教育及语文教育研究方向,负责人为赖瑞云研究员。

研究中心将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方向组成的创新团队为载体,以出精品成果为目标,努力强化特色与优势。联系整合省内乃至国内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资源,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造就一支高水平、结构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创新团队,打造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中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专业人才库和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为促进研究中心建设目标的实施,我们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建师范大学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集刊”。该集刊主要收录研究中心同仁高质量的个人学术著作。列入研究中心学术集刊首批出版的十本著作,绝大多数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如《晋唐佛教文学史》(李小荣著)、《中国英国文学研究史论》(葛桂录著)、《冈仓天心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亚洲言说》(蔡春华著)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如《建阳刊刻小说研究》(涂秀虹著)、《明代中古诗歌批评文献及诗学研究》(陈斌著)、《台湾诗钟社团及相关组织考略(1865—2014)》(黄乃江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研究》(李春晓著)、《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冀爱莲著)的结项成果。这些成果在课题结项评审专家审定意见的基础上,再次打磨修订,因此保证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质量。研究中心成员承担的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拟列入这套学术集刊出版。另外,本研究中心与文学院合作还搭建了两个学术平台《细读》、《圆桌》,研究成果亦由人民出版社刊行,为国内外学者诠释中华文学经典、探讨重大理论问题、思考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学术阵地。

中华文学传承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8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绪 论 / 1

第一节 空间诗学：理论导引 / 3

第二节 台湾当代散文空间诗学问题 / 22

第一章 道路诗学 / 33

第一节 想象巷弄的三种方式 / 37

第二节 台北老街的三副面孔 / 52

第三节 中山北路的时空考古 / 62

第二章 高楼诗学 / 77

第一节 由巷弄到高楼的空间转型 / 80

第二节 高楼的语义结构：两极化与单向度、荒原与神性 / 88

第三节 “台北 101”：都市消费的空间象征 / 97

第三章 场所诗学 / 101

第一节 家的空间形式及其语义结构 / 104

第二节 中山堂的空间形式及其周边日常生活 / 120

第三节 台北咖啡馆地图与文艺共同体想象 / 133

第四章 区域诗学 / 147

第一节 西门町：殖民统治、威权体制与流行文化空间 / 150

第二节 东区都市空间形式及其感觉结构 / 162

第三节 市井消费空间：台北商圈的空间漫游 / 180

第五章 边界诗学 / 185

第一节 淡水河和基隆河：从生活空间到城市边界 / 187

第二节 铁路：边界意象与工业乡愁式感觉结构 / 214

第三节 捷运系统：消费社会的都市奇观和心理时空 / 225

第六章 台湾当代散文创作思潮与空间诗学 / 235

第一节 台湾当代散文家都市空间理论评介 / 237

第二节 台湾当代散文中的超现实时空形式及其意义结构研究 / 250

第三节 台湾后现代散文差异空间美学研究 / 261

结语 / 267

参考文献 / 269

后记 / 284

绪 论

第一节 空间诗学：理论导引

一、宏观与微观：从文学地理学到空间诗学

当前，文学地理学已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也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国内的相关研究有着较强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方法的原创性。

在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02）到《文学地理学会通》（2013），杨义的研究在国内一直起到开风气和奠基性作用。他从文化战略角度讨论了文学地理学的文化资源与学术方法在建构多民族中华文化（文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在《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与方法》一文中，杨义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敞开了四个巨大的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① 其设计的文学地理学会通研究有三条思路，分别是：整体性、互动性和交融性。杨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立足于描绘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地图这一战略高度，力图建构中国文化—文学地理学学科蓝图和方法论路径。

在《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一文中，杨义再次重点将“地图”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思考。所谓文学地图“当然是文学这个独特的

^①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4 台湾当代散文空间诗学研究

精神文化领域的专题地图,它有独特的地质水文气候和文化生态,它要揭示文学本身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文化身份,以及文体交替、经典形成、盛衰因由这类复杂生动的精神形成史过程”^①;如以文学地图的空间维度结合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精神体验的维度,将构成一种多维文学史结构。这里,杨义更强调对生命—文学—文化生成过程的分析,力图呈现作家个体、文学审美形态与地域文化三者之间动态的、鲜活的生成过程。他还进一步提出“文化推原法”,即将文学放在文学生存的原本状态进行考察。近年来,杨义的大量著述都以这种推原法对先秦诸子展开多维、动态的研究。通过文学与地图的互动研究,“以文学生命特质的体验去激活和解放大量可开发、待开发的文学文化资源,又以丰富的文学文化资源充分地展示和重塑文学生命的整体过程”,这是杨义的基本思路。由此形成的文化战略则是:“作为现代大国,中国应有一幅完整、深厚而精美的文学地图”^②,以此可与世界文学—文化展开平等对话。

相对于杨义的文化战略眼光和布局,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更具体阐释了文学文本与文化地理之间的深层关系。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中,曾大兴界定了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他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包括:“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③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

①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57—58页。

③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

系”^①。

由上观之,以杨义、曾大兴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者,多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和学科意识。他们注重文学诸要素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考察,还原文学与地理文化互构的心灵和历史过程,重构处于地域文化中的多元文学史图景,并力求建设中华多民族文化—文学体系。

值得思考的是,文学地理学,除包括上述宏观的文化—文学研究的向度之外,还应包括微观的地理空间—文学关系的分析向度。前者规划中华文化圈中区域文化—文学的多元形态和诗学景观;后者则通过细致的作品阅读、地方实证和个体感知,确立文学地理学的基本诗学规则。比如,我们在考察作家、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是:作家如何感知地方、表达地方?只有厘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文学地理学中的区域文化类型、族群分布、文化空间的转移与流动等宏大问题时,才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石。我想,杨义的“文化推原法”就包含了这方面的思考。在分析屈原《天问》中的时空错乱这一问题时,他就还原了屈原创作时的精神紊乱与楚庙壁画中诡异绚丽的时空形态之关系。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必须同时注意到空间诗学的元理论问题。这部分就涉及哲学和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可以说,空间诗学对作家感知和表现空间所遵循的基本法则等问题的研究,为文学地理学提供一套基本的概念和可操作的分析方法,同时也赋予文学地理学以文学史和诗学的双重维度。

二、地理空间与文学书写的关系

这里,我们将进一步对地理空间和文学书写的基本关系展开思考。英国的文化地理学者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专章讨论了文学创作和地理的基本关系。他说:“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

^①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2 页。

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一种社交媒体，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这些作品，反之也被它们所影响。”^①因此，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描述某些地理空间，而是参与“创造了这些地方”^②，参与到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共同体的创造进程中，形塑地方的感知和表达，建构地方独特的文化心理。文学的地方书写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存在多重互构的关系。而文学文本结构、创作手法、作家体验的转变，也跟地理空间的整体裂变存在根本关系。

从乡村到城市无疑是现代社会空间演变的主要趋势。作家对这一空间转型的书写，包含诸多复杂的现代性体验。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便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系统研究了英国文学中乡村与城市这一主题。威廉斯指出，人们通常对乡土和城市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局限的地方。”^③而威廉斯的研究突破了这种模式。他认为，英国文学中的乡村和城市书写存在多重的异质性空间和感觉结构。

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英国文学中早期的田园诗（16—18世纪）将乡村理想化为静谧、纯朴、慈善和富足之境，而漠视乡村中存在着贫穷、劳作与剥削的阶级状况。诗人们站在没落贵族的价值立场上批评农业资本主义兴起带来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们将城市视为邪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日益分崩离析，乡村诗歌（18世纪）呈现出处于新旧秩序冲突中的乡村文化与含混性的感觉结构：既有“对失去的朴素世风的叹惋”；也有对不公平现实的抗议，对圈地运

^①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动中农民土地的被剥夺和对劳工苦难生活的表现。^① 18 到 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城市也有一种典型的含混性：一方面城市是文明的标记，是进步和启蒙的象征，是自由和秩序的中心，是“光明之城”；另一方面城市又是黑暗、贫穷、罪恶和肮脏的，是病态的“肿瘤”和“黑暗之城”。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大都市和工业文明陷入了危机，作为孤独而绝望的死亡之城，城市成为“人类生活状况的象征”^②。而乡村成为城市和资本的附属空间，文学中的乡村呈现出空前的混合性：有被高度资本化、变成消费场所的乡村，有按照资产阶级惯例记录离奇的乡村；也有真实描写农村劳作和生活的乡村；还有作为殖民地富于“异国情调”的乡村……除了乡村和城市这两个文化空间之外，威廉斯还考察了作为“边界”（border）的空间，它处于乡村和城市的交界地带。这种“边界”空间既是乡村向城市过渡的地理空间，也是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过渡的文化空间。因此，“边界”空间具有“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经验和视角，在变迁过程中包含更复杂的异质文化冲突。^③

威廉斯从“乡村”、“城市”、“边界”这三个地理—文化空间考察英国现代文学地图，颠覆了“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空间转型的整体考察，把握到文学作品中深层次的感觉结构，从而凸显出充满矛盾性、复杂性和异质性的英国社会空间文化形态和整体脉络。

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文化空间的研究堪称典范。其宏大的视野、多元的思路与细腻的文本解读，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方法。有趣的是，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则在《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一书中对文学与城市文化这一议题作出更系统的考察。

利罕认为，城市是一个变化中的而非静态的领域。随着物质的城市不断演进，文学——尤其是小说——对它的再现方式，也在不断地演进。^④ 他将现

^①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01—110 页。

^② 同上书，第 321 页。

^③ 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289 页。

^④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0 页。

代城市划分为三个持续的发展阶段：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和“世界级”城市（“world stage” city），并认为城市的兴起与各种文学运动关系密切，“尤其是与小说和继之而起的叙事模式——喜剧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①。喜剧现实主义和浪漫现实主义提供了对商业城市的洞见；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提供了对工业城市的洞见，后现代主义则提供了对后工业城市的洞见。^② 启蒙运动把城市描绘成“加在自然身上强有力规范”，即商业城市所遵循的理性的力量、自然权利和由金钱主导的商业秩序；而浪漫主义则探究“那个规范所压抑了的东西”，亦即城市中被摧残的人性、邪恶的原始本能、废墟与死亡。自然主义者分享了浪漫主义的怀疑，他们把城市描绘成一个能量系统和一种异化的机制，它创造了一个脱离于自然的病态的中心，因而加速推动了衰退的进程，包括个人、家庭与国家的衰落。^③ 而自然主义最终被现代主义所取代。这意味着，“作为物理空间的城市，被一种心灵状态所替代”^④，都市形象体现为艺术家的内在感觉和印象，“客观的城市形象向主观的城市形象的转变”^⑤。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叙述方法上的差别在于：

现代主义质疑自然主义的基本前提，它从科学主义转向一种以神话/象征为基础的方法，以循环的时间代替线性的时间，它允许用一种柏格森的主观现实性来代替科学的经验主义，并创造了一种对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精英主义的划分方式。……自然主义笔下的城市呈向心状态：生活被一个都市力量中心所控制；而现代主义笔下的城市呈离心状态：中心引导我们向外，面向空间和时间中的象征对应物。自然主义的叙述者从一个中心观察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而现代主义的叙述者却发现，中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模糊，叙述者自己的视野也变得越来越主观。

^①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380页。

^③ 同上书，第88页。

^④ 同上书，第96页。

^⑤ 同上书，第92页。